

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毕学进 马金华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新中国70年来,公债史研究经历了起步期、沉寂期、复兴期和繁荣期等阶段,亦经历了多元路向演化过程。在债务结构上,公债史研究经历了从外债到内债的研究嬗递;在地域上,经历了中央公债到地方公债的区域转变;在内容上,经历了从公债统计到规律探索的视域演进;在方法上,经历了从定性判断到计量实证的转换;在研究对象上,则经历了从政府单一主体到其他相关主体为研究对象的多元化衍变。反思并展望公债史研究的趋向,需要进一步打破历史区段畛域,拓宽研究地域,倡导跨学科交叉进一步合作,以动态的视野、广博的视域和多维的方法,推进公债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关键词:公债史;内债;外债;内国公债;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20)04-0011-09

DOI:10.16392/j.cnki.14-1057/c.2020.04.002

公债史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引起了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高度关注。新中国70年来,公债史研究新理论不断运用,新方法不断尝试,新视角不断拓宽,取得丰硕成果。

关于公债史的整体研究,前贤研究新论频出,然而略显遗憾的是,对于我国公债史研究整体路向缺乏回顾与反思,尤其是对于新中国70年来公债史研究的图景与嬗变轨迹鲜有关注。基于此,本文尝试梳理新中国70年来公债史研究的基本情况,展现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面相图景,分析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演进过程,反思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不足,并展望公债史研究的未来趋向。

一、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回顾

(一)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阶段分布

新中国70年来,公债史研究成果数量呈现出整

体上升的趋势(如图1所示)。在时间分布上,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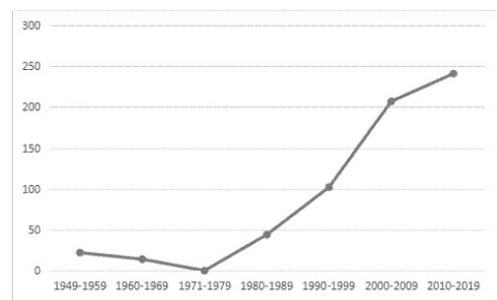


图1 1949-2019年公债史研究成果数量时间分布^①

第一阶段为1949-1959年,该阶段为新中国公债史研究的起步期,初步有公债史相关研究成果问世,大多数集中在“旧中国”之“恶债”分析上。

第二阶段为1960-1979年,这一阶段为公债史研

收稿日期:2019-12-29

作者简介:毕学进,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政学。

马金华,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财政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代财政转型与国家财政治理能力研究”(项目编号:15ZDB037),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北洋时期云南省内债研究(1912-1927)”(项目编号:2019Y0208)阶段性成果。

^①以上数据来源于知网与读秀系统的文献整理与统计。统计中,以“外债”、“内债”、“内国公债”、“公债”、“政府债务”(近代)作为检索词,将论著标题、关键词、摘要、章节一级标题等作为检索对象,检索文献共630篇。

究的沉寂期,鲜有研究成果问世。

第三阶段为1980-1989年,为公债史研究的复兴期,这一阶段因改革开放之影响,在学术界倡导思想解放,公债史研究逐步复兴,打破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中国”“恶债”等片面认识,对近代公债史评价逐步趋于理性。

第四阶段为1990-2019年,这一时期为公债史研究的兴盛期,研究成果数量基本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关于公债史研究,不仅在方法上引入计量工具,在研究对象上,亦延伸到银行、钱庄等不同研究对象主体,研究逐步趋于多元化。

学科领域研究亦有阶段性周期,一般认为学科的周期性包含生成与孕育期、发展与成长期、稳定与成熟期以及衰退与蜕变期等多个阶段^①。按我国公债史研究的阶段历程,因受文化大革命等因素影响,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公债史研究尚不成熟,因此可将1949-1989公债史研究归入生成与孕育期,1990到至今,公债史研究全面繁荣,因此可将该阶段归入发展与成长期,即学科研究成果迅速增多,研究有显著成果产出,成为较为热门的研究领域。未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公债史研究将会形成成熟的研究范式,研究成果数量亦会逐步趋于稳定,进入稳定与成熟期阶段。

(二) 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热点

通过公债史研究的频次词分析,直观展现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热点内容(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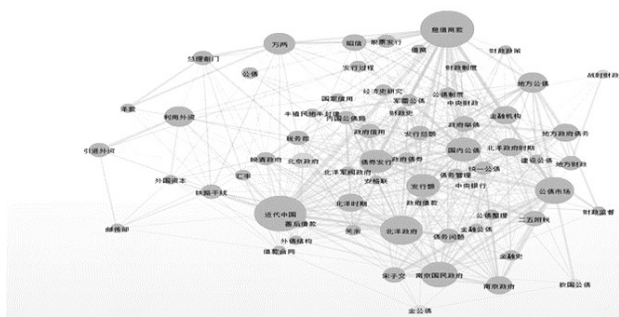


图2 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热点频次词^②

第一,从研究关注的历史区段分析,公债史研究

的主要历史段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两个时间段。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与北洋政府时期公债发行数额巨大,同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公债管理制度,因公债种类多,数量大,公债发行亦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效应,研究切入点多,故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历史区间段。除此之外,晚清公债史也成为研究的热点,热点频次词“息借商款”、“昭信股票”等公债名为晚清政府发行,热点频次词“总理衙门”又为清政府的外债议准经办部门,因此晚清公债史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清末因关税自主权丧失,加之太平天国政权长期割据于清廷财政咽喉江南之地,另清末地方实力派崛起,中央财权下移,清政府财政陷入巨大困境,不得不求借于外债,关于晚清外债史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外债与晚清政局层面展开。1894年因甲午海战爆发,清廷准发息借商款,产生近代中国第一支面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内国公债。1898年清廷再次公开发行“昭信股票”,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支面向普通大众公开发行的内债。上述两支公债的发行虽效果甚微,但为中国近代内国公债之先河,故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第二,从热点研究内容分析,关于外债的热点频次词包括“外债结构”、“洋款”、“外国资本”等。另近代多次筹借外款修建铁路,热点频次词“铁路干线”主要围绕外债展开。因多数学者认为,外债举借加剧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进程,因此热点频次词“半殖民地半封建”也与外债高度关联^③。

关于内债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进入民国以后,政府依靠内债以纾财政困境,内债成为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救命草”,也成为近代公债史研究的重中之重。整合其高频词,包括“发行总额”、“债券发行”、“发行过程”、“公债制度”、“政府信用”、“内国公债局”、“公债整理”、“军需公债”等。“发行总额”表明学者们对公债史的研究重视内债数额基础统计分析,而“债券发行”“发行过程”则表明学者们重视近代公债发行的过程探讨。“公债制度”“政府信用”“内国公债局”等关键频次词表明学者们对近代公债的管理制度较为关注,尤其是对内债的管理机

①目前对学科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尚未有统一标准,但大多数学者认同学科研究存在孕育、生成、发展到成熟与衰退蜕变等多个阶段。参见张松等:《生命周期视角下新兴学科的生命发展评价研究》,《科学学研究》,2018年第5期。

②通过对论著的标题、章节一级标题、关键词、摘要等出现的词进行统计,将累计出现五次以上的词汇作为热点频次词进行统计得出。

③此种论述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后,代表作有魏子初《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三联书店,1954)、蓝以琼《揭开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黑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中华书局,1983)等。

构、内债债信维护等较为重视。“公债整理”等关键频次词表明学者们较为关注近代内债的违约研究。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有三次债务整理案,表明政府已无力按期偿还内债本息,关于“公债整理”的研究,也多数集中于三次公债整理案的分析上。“军需公债”则表明学者对公债史用途较为关注。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总计发行六支军需公债,另有多支公债亦用于军需支出,表明了近代公债的军政用向。高频词“债务问题”则表明学者们对公债发行所引发的问题较为关注。多数学者认为,民国时期政府公债发行数额特别巨大,且用于非生产、非实业性投资,引发通货膨胀、实业萎缩等,不少学者亦尝试利用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分析民国时期公债引发的社会经济效应。

第三,从研究的区域分析,热点频次词“北京政府”、“南京政府”等,表明公债史研究关注中央政府公债。而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公债”、“地方政府债务”、“地方财政”等热点频次词的出现,表明公债史的研究亦关注地方政府所举借或发行的公债。

第四,从研究的公债对象主体分析,“北京政府”、“内国公债局”以及“宋子文”等高频词表明公债史研究主要是以政府为研究的对象主体。然而,公债发行与财政金融桴鼓相应,休戚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正是由于公债发行与其他相关主体的“多骨诺米牌”效应,公债研究的对象亦以其他金融机构为主体展开研究,诸如“汇丰银行”等,表明公债史研究对象的多元化。

二、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演进

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热点内容包括了外债与内债、中央公债与地方公债、以政府为主体或其他金融机构为主体的诸多研究,所论颇丰。如若从动态视角分析,新中国70年的公债史研究,经历了如下过程。

(一)从外债到内债:新中国70年公债史的结构研究嬗递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内债研究缺乏足够关注,仅有任静吾1953年发表的《十年内战中蒋党政府的公债与经济垄断》^[1]、千家驹1955年发表的《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2]105-135}等少量文献,而反观外债史的研究,则成果频出。主要有孟默闻的《美蒋勾结史料》^[3]、钦本立的《美国经济侵华史》^[4]、王绳祖的《侵略中国的英美财阀》^[5]、孙毓棠的《美帝国主义攫占三都

澳的阴谋与所谓“海军借款”》^{[6]71-83}、洪葭管的《从汇丰银行看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金融统治》^{[7]35-47}等,可谓是一结累累。因政治形态等因素,这一时期无论是内债史还是外债史研究,都集中在批判性研究上,对内债与外债皆持否定态度。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因经济重建需要巨大资金支持,中央政府逐步恢复国债发行,关于内债研究,逐步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与关注,主要代表作有千家驹《论旧中国的公债发行及其经济影响》^{[8]49-65}、张祖国《略论中国近代国内公债的特点》^{[9]58-63}、单宝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公债》^{[10]98-100}、王素琴的《中国国内公债小史》^{[11]49-50}、王磊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债研究》^{[12]74-87}、金普森等的《南京国民政府1933-1937年之内债》^{[13]81-88}、王同起的《评1927—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内债政策》^{[14]33-39}等,相对于外债研究而言,改革开放后关于内债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尤其是1994年以后,随着中央分税制改革的实行,我国地方政府举借内债成为可能,关于内债史的研究,更是呈现出井喷式增长,这一时期虽也有外债成果问世,诸如马陵合的《晚清外债史研究》^[15]、马金华《外债与晚清政局》^[16]等,但是内债史研究,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等,均已取得重大突破,俨然一枝独秀。具体而言,内债史研究时空范围不断扩大,一改偏重清民时期、倚重中央层面的研究局面,关于中国经济建设内债以及地方政府内债的研究成果逐步增多,例如马长伟就对建国初期安徽省的经济建设公债进行了研究^{[17]101-113}。关于内债研究,也一转“恶债”的定性研究之风,大多数学者对近代内债发行的客观性作用进行了客观辩证评价,例如孙建国认为,近代公债发行的债信维护具有积极作用^{[18]42-57}。这充分拓宽了内债研究的视野。整体而言,新中国70年我国公债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外”到“内”的逐步转变过程。

(二)从中央到地方: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地域演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90年前后,学者对于政府公债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中央层面,例如肖灼基的《四大家族的公债投机活动》^[19]、千家驹的《关于四大家族国家垄断资本的一个研究——四大家族国家垄断资本与公债发行》^{[20]55-66}、单宝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公债》^[10]、金普森等的《南京国民政府1933-1937年之内债》^{[13]98-100}等,对于地方政府公债鲜有关注。

进入1990年代后,关于地方公债的研究初步引

起了学者的重视。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该阶段我国区域史学研究开始兴起,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学术研究亦受全球视野的影响,国外区域史学研究逐步进入国内,区域史研究逐步分化,诸多细分领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21][28-135]}。这一时期,对于区域性公债的研究逐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1990年,左治生初步统计了北洋政府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公债的发行情况^[22],地方公债研究开始引起学者们关注。而后杨勇刚编撰的《中国近代铁路史》对近代地方铁路修建公债的发行进行了统计和研究^[23]。

进入21世纪后,关于以省域为中心的地方公债研究呈现出“云屯雾集”之特征,不仅数量众多,且研究区域较为集中,主要围绕江、浙、沪、皖、川、闽、粤等地展开。例如潘国旗2009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地方公债研究——以江浙沪为例》系统统计了近代江苏省、浙江省等地公债发行数额及其特征,还对近代地方公债的起源以及其它省市的地方公债进行了统计,较为系统地探寻了地方公债发行、偿还、交易和管理等运行的规律^[24]。2012年刘杰则对近代安徽省的公债展开研究,主要对1910年—1941年安徽的地方公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25]。2011年赵天鹏对1920—1941年四川省的地方公债发行进行了研究,详尽统计了四川省1920—1940年的公债发行额并对其公债进行了评述^[26]。2014年,潘国旗又对近代皖川闽粤的地方公债进行了研究。他综合运用了财政学、计量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对安徽省、四川省、福建省、广东省等地区的公债发行规模和依存度以及偿还机制进行了综合的探讨和分析,还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各省地方公债的发行情况进行了横向的对比与分析,得出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一些启示^[27]。马金华等对近代浙江公债发行的规律与特征进行了总结,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近代浙江地方公债的发行进行了评析^{[28][92-96]}。潘国旗2018年发表的《北洋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探析》,又对北洋时期各地的地方公债发行问题做了进一步梳理,指出了北洋时期17个省区发行了将近150亿元地方公债,有66%以上用于军政费用支出^{[29][216-226]}。

这一时期地方公债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研究区域突破了省际畛域,研究视角延伸至以市域为中心的公债考察。例如陈海懿对南京市特种建设公债发行始末进行了研究^{[30][55-59]}。罗宁对武汉推销人民

胜利折实公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对武汉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推销筹备工作、公债认缴的困境以及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31]。但是相关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大型城市,尚有待深入。

(三)从公债统计到规律探索: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视域演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学者将研究的视域集中在公债的统计上。在内债史料整理发掘上,早在1955年,千家驹就整理了《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对近代公债发行与管理的原始史料进行了整理,是研究公债史的参考佳作^[32]。1987年,沈云龙又主编出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中国公债史料》,整理了1894—1949年公债发行的政策文件^[33]。因内债与不同金融主体具有极大关联,诸如钱庄史、银行史等资料整理中,对公债史也有提及,诸如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整理的《上海钱庄史料》^[34]、黑广菊等整理的《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35]、蒙秀芳等整理的《金城银行档案史料选编》^[36]等资料内,对钱庄、银行购买公债的数额、与政府往来信函等皆有整理。在外债史料的整理发掘上,1962年,徐义生编著《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对清政府到北洋政府时期外债借用额、偿还额、用途、利息率等详细数据进行了统计^[37]。同年,刘秉麟编著《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不仅统计了清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债额等数据,同时对外债举借的具体过程进行了详尽描述^[38]。1990年,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共同整理了《民国外债档案史料》,内含民国时期外债举借统计数据、合同、公函、照会稿、电报、密呈、议案等,这是迄今最为详尽的外债档案史料汇编,参考价值极大^[39]。另还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1991年整理的《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40]等外债资料,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整理史料的同时,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内债规律的理论探讨。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利用经济学、财政学等理论分析近代公债发行成为可能,学者们对于公债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公债数据统计上,开始将研究视域转换至内债相关机理的探寻上。

首先是关于内债的经济效应规律探讨。例如马长伟对民国初期内债的举借及其效应进行了研究,认为民国初期内债发行丧失了国家利权,对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41][26-131]}。姜良芹对1927—1937

年南京国民政府内债发行的经济社会效应进行了分析, 她认为, 南京国民政府巨额内债引起了银行的惜贷, 导致财政与金融极其紊乱, 制约了经济的发展^{[42]87-94}。潘国旗的专著对国民政府1927-1949年的国内公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不仅统计了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到覆亡期间公债发行的历史数据, 与此同时, 还联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财政、经济政策进行关联分析, 对每一阶段国民政府公债发行都进行了评述, 指出政府信用不良、折扣率高等影响了公债效应的发挥^[43]。孙建华对抗战前10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债结构的变迁与影响问题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公债发行呈现出内债化、国债化和多元化三大结构性特征, 原因在于需通过多元化的公债来维持日益高涨的军政开支。这导致政府投资效应不能充分发挥, 影响了经济的发展^{[44]52-53}。

其次是关于公债管理及其变迁规律的探寻。学者们围绕近代政府公债管理的体制、整理及其变迁规律做了大量的研究。刘杰对1914-1927年政府公债管理机构(由总税务司、二五券会到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和制度变迁进行了分析, 认为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实现了内债的统一管理^{[45]115-122}。姜良芹则对1932年债务整理案进行了研究, 认为债务整理案破坏政府的债信,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政府的财政负担而言有所减轻, 且也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46]52-63}。姜良芹对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务整理案进行了分析^{[47]74-99}。另外, 姜良芹还对1927-1937年国民政府公债市场监管体制进行了评析, 她引用了大量的法律法规, 反驳了以往学者认为是国民政府对公债的事财监管力度不足而造成的公债流通市场稳定性差的观点^{[48]150-155}。刘晓泉对国民政府公债管理的政策进行了述评, 对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公债的程序、偿还、监管等政策进行了描述与分析, 认为政府对公债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公债的债信^{[49]98-105}。

还有关于公债其他规律探寻的研究。王平子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思路, 分析了从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前中国政府内债的违约问题, 探寻了公债违约之原因^{[50]80-92}。廖常勇则分析了清末国债的财政制度效应^[51]。江晓成还分析了政府债务与地方官吏的因应博弈问题^{[52]94-105}。缪明杨对我国近现代政府举债的信用激励以及约束机制进行了分析, 他利用产权约束理论和信用制度理论, 提出了政府公债的发行与管理必须建立良好的信用^[53]。

(四)从定性判辨到计量实证: 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方法的转换

自新中国成立伊始, 史学研究遵循传统道路, 对于诸多史学问题, 大多数是采取定性判辨的模式展开研究, 对于公债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到1990年前后, 公债史研究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要方法, 很少有量化工具运用于公债史的研究中。1990年后, 量化历史研究在国内引起关注, 不少学者尝试利用量化模型分析经济史问题, 例如吴慧就对明清财政结构性的变化进行了计量分析^{[54]39-45}。这拓宽了历史学, 尤其是经济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目前, 孙迪通过量化分析的方法, 对民国时期经济建设公债的效应进行评价分析。他利用计量模型, 分析了经济建设公债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并对影响经济建设公债的效益进行了量化分析^[55]。王平子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 测量了1928-1936年政府公债指数以及历年的相关性, Pearson检验发现内债与利率相关性小、关税与内债额具有显著相关性特征^{[50]80-92}。姜良芹则充分引入了财政学、经济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 将1927-1937年的政府公债的债务依存度、财政负担率进行了实证测度, 与此同时, 还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内债的绩效进行了统计量化分析,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尝试^[56]。刘杰则对政府公债与银行业发展效应进行了回归分析, 他选取政府公债的发行额度、银行数量、银行资产额、银行收益等相关系数进行了Pearson检验, 发现近代政府债务与银行业的资本与收益存在显著关系^[57]。燕红忠则利用相关性检验的方法, 选取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府的债务、银行资力以及彼时的股票市值在95%的置信区间下进行实证计量分析, 研究发现近代新式银行的发展、公共债务市场的形成与近代股票市场之间没有显著关联性^{[58]108-120}。杜恂诚认为近代公债已经进入金融市场, 也成为近代银行券的发行准备, 推动了近代证券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但是他同时通过计量回归的分析发现, 利率与公债的价格没有显著相关性, 表明金融市场与政府公债尚没有完全融为一体, 政府公债发行价格或许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59]37-47}。

总结公债史研究从定性判辨到计量实证的过程, 利用多元化交叉的学科分析方法, 对近代公债发行的定价、债务依存度、经济社会效应等进行客观的计量呈现,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单一的定性判辨研

究。目前利用计量方法研究近代公债的学者有相当一部分拥有经济学的学科背景,例如孙迪、燕红忠、杜恂诚等,这说明近代公债研究,也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略显遗憾的是,关于公债史研究计量分析尚且较少,且多数集中于简单的回归检验分析,计量分析方法的运用有待进一步发掘。

(五)从单一到多元: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对象衍变

公债的发行或举借主体是政府,“公债为国家财政之信用收入,从人民或他国借来,将来仍须计息偿还,发生支出,故为国家之债务。”^[60]正因此,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公债研究的主体都是围绕政府展开。外债举借主体为国家与国家之间达成的交易,故外债史研究围绕政府展开无可厚非,但内债史面向的对象是内国公民或其他组织,故内债研究单纯以政府为主体展开有失偏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我国内债史研究主要以政府为主体展开,例如1955年千家驹发表的《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1962年千家驹发表的《关于四大家族国家垄断资本的一个研究——四大家族国家垄断资本与公债发行》^{[20]55-66}、1987年单宝发表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公债》^{[10]98-100}等。因内债发行或举借的对象是银行、人民群众、商会等不同群体,相关研究对这些主体的关注较少,内债研究对象相对单一化。

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一局面方有所打破,有学者已经关注到金融市场与政府公债的关系,转变了单一的政府视域研究。例如1984年姜鲁鸣发表《从一份公债合同看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几个特点》一文,将近代公债研究视角转变到金融资本视角,打破了公债史研究以“政”为“一”的研究视域^{[61]104-110}。而后,以金融主体为研究对象的近代公债史研究开始逐步增多。

在以银行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方面,金学文探讨了近代银行业与政府公债买卖之关系^{[62]46-47}。邓宜红分析了1935年前的银行业对待政府公债态度及其转变过程^{[63]108-117}。钟思远则考察了近代私人银行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了私人银行的公债投机活动以及公债投机对银行发展的影响^{[64]107-118}。朱荫贵则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银行业与政府公债之间千丝万缕之联系^{[65]174-189}。薛念文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政府公债买卖及其他关系进行了分析^[66]。诸静分析了政府

内债政策对金城银行放款影响^[67]。蒋立场则分析了1928-1931年上海银行业对政府内债投资的状况,并对上海银行业就政府内债投资的进退两难的艰难平衡进行了评述^{[68]101-106}。刘杰对1897年-1937年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制度与制度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对近代银行业与公债的经营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对近代银行业对公债的经营,面临的政治和市场双重风险进行了剖析^[69]。从以上研究回顾可以看出,以银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公债史展开研究,主要集中于银行与政府内债发行之关系的研究。

在以金融业同业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方面,吴景平对上海钱业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若干内债关系进行了分析,对上海钱业公会承销政府债务及其态度与决策立场进行了考证^{[70]56-86}。郑成林与刘杰对上海银行公会与1920年代北京政府内债整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对上海银行公会与民间内债监督管理展现的近代中国的多重社会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71]113-122}。刘杰对1927-1937年上海银行公会与政府公债发行关系进行了探析,并对银行公会就政府公债发行下如何维持自身利益与政府的博弈进行了分析^{[72]87-96}。

在以资本家团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方面,刘杰从商人团体视角对1927-1937年公债发行进行了分析,分析了商人团体内的互动与政府机构的博弈以规避风险的过程^{[73]144-152}。杜恂诚对1840-1937年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财政与公债关系亦略有论述^[74]。但是整体而言,以资本家或商人团体为中心的公债研究考察尚不多见。

整体而言,公债研究对象已经打破了以政府为中心的研究,研究对象的多元化趋向,表明学者们已经关注到公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从不同研究视角的切入,窥见了近代公债相关主体的基本面相,拓宽了研究的视野。

三、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总结新中国70年来公债史研究的成果,并对其基本路向进行梳理,可以发现70年来国内公债史研究经历了一个研究成果由少及多、研究方法由简及繁、研究视域由窄及宽的过程。然而,在公债史研究上,依然还存在研究时间段上存在非对称性与割裂性、研究空间上存在地域不平衡性和研究方法单一性等问题。未来公债史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打破断代

畛域,拓宽研究地域,鼓励跨学科交叉合作,对公债史进行连续性的、宏观性的、立体性的研究。

(一)打破历史区段畛域,以动态视野探寻长时段下公债史的规律演变

从研究的时间段维度分析,新中国70年来学术界关于公债史研究的热点时间段主要集中于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于晚清及新中国成立后公债研究相对较少,呈现出研究时间段的不对称性,另外学术界对于公债史研究还存在时间的割裂性,缺乏动态研究视野的考察。例如对于晚清内债、北洋政府时期内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债都是以政治时间为中心展开考察,诚然公债是以政府为中心发行或举借的债务,但公债同时又是一项经济活动,公债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等规律是长时间形成的,如若割裂,对公债史之研究可能呈现出碎片化的态势。因此,需要打破断代畛域,鼓励长时段的公债史研究探索。例如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可以作为一个时间段,探寻我国近代公债形成与发展的演变过程,北洋政府时期与南京国民政府也可以作为一个时间段,探寻近代我国公债违约、管理、以及与其他社会团体关系的动态嬗变等,如若有关长时间大视野的动态考察,或能达到“通古今之变”之效,对公债史相关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动态透视。

(二)拓宽研究地域,打破公债史研究区域的非平衡之态

从研究的空维度分析,新中国70年来公债史研究在地域上呈现出区域的不平衡性,即中央与地方研究的不平衡性与省域之间研究的不平衡性。首先是中央内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要远远大于地方内债的研究。目前中央层面的内债研究,关于企业发行、管理、违约、经济社会效应等论述颇丰,但是从地方内债的研究内容上看,大多数学者对地方内债的发行、统计、概述较多,对其发行的前因后果、内债募集、管理、担保、债信维护等研究依然不够系统,研究内容也有待进一步拓宽。其次是研究的地域之间也有非平衡性,省域为中心的地方内债的研究,多集中在直隶、安徽、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对于其他省份的内债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对于边疆地区的内债发行研究目前鲜有学者提及。例如北洋时期云南省累计举借、发行内债超过1亿元,但是目前尚没有学者予以关注。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新中国70年来,公债史研究地域视角延伸的“最后一公

里”是地级市,鲜有学者关注到最为基层的县域公债,例如北洋政府时期安徽省合肥县就发行过四支公债,但是没有学者关注,研究地域还有待进一步延伸。

因此,未来公债史研究还需拓宽研究地域,打破公债史研究区域的非平衡之态。一方面,对于地方公债研究,尚需突破单纯的地方公债统计研究,对地方公债发行、举借的前因后果、发行管理、经济社会效应等进行深层次挖掘。另一方面,对于鲜有引起学者关注的诸如云南、贵州、广西、西藏等地的公债需进行进一步整理,绘制我国近代地方公债发行数据图谱,以打破省域之间研究的不平衡之态。再一方面,关注县域公债研究,不仅能拓宽公债研究的地域视野,更能从新的视角切入了解近代县域财政真实的历史图景。

(三)倡导跨学科交叉研究,倡导多维方法下公债史规律的立体透视

从研究方法维度分析,新中国70年来,公债史研究在方法上经历了一个由定性判断到计量实证分析的转变过程,跨学科方法在公债史研究中已有成果,例如不少学者对近代政府的债务依存度等进行了测量,并对公债的某些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展开了计量分析,但是实证研究方法依然较为单一。梳理利用计量方法研究公债史的成果便可发现,大多数学者的量化方法都是Pearson检验及其他简单的检验方法,计量手段尚且较为单一。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公债史是一个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领域,经济学家不谙历史,历史学家又难熟经济,而跨学科合作在公债史研究中尚且较为少见,造成公债史、计量史研究陷入两难之困境。

近年来,随着公债史料的大规模出版,不少近代公债的数据得以面世,这为公债史的量化分析提供了一定的深入机遇,未来可以提倡跨学科合作,对近代债券价格与金融市场利率、近代政府债务风险测度等进行进一步研究,拓宽研究之深度。另一方面,跨学科理论在公债史研究中尚有进一步运用空间,例如货币理论界定公债之实际性质、挤出效应理论分析公债造成的社会经济效应、博弈理论解释公债与不同群体的关系因应等,尚有较大研究空间。

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作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多元交叉的学科合作分析下,公债史研究离不开数据的支撑,虽然近年来整理的近代公债史料

众多,然而略显遗憾的是,大多数整理之史料未能形成信息数据,公债史研究仍需依靠传统的人工数据搜集与整理,不仅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同时容易导致数据搜集的碎片化和研究的偏颇性。信息数据不仅能为公债史数据检索带来便利,同时也能全面呈现近代公债的数据图景,为研究带来极大便利,因此迫切需要构建公债史研究的数据库。目前史学多个领域已经构建了信息数据库,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缙绅录》已上线试运行,对清代官员的仕途量化、家庭与社会关系窥探计量等提供了便利。公债史研究需进一步收集近代公债数据,利用信息数据库,构建公债史的大数据库,为公债史的研究提供便利。

[责任编辑 李卫民]

参考文献:

[1]任静吾.十年内战中蒋党政府的公债与经济垄断[N].光明日报,1953-09-19.

[2]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J].历史研究,1955(2).

[3]孟默闻.美蒋勾结史料[M].北京:新潮书店,1951.

[4]钦本立.美国经济侵华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

[5]王绳祖.侵略中国的英美财阀[M].北京:三联书店,1956.

[6]孙毓棠.美帝国主义攫占三都澳的阴谋与所谓“海军借款”(1900—1922)[J].历史研究,1954(2).

[7]洪葭管.从汇丰银行看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金融统治[J].学术月刊,1964(4).

[8]千家驹.论旧中国的公债发行及其经济影响[J].文史哲,1983(6).

[9]张祖国.略论中国近代国内公债的特点[J].经济问题探索,1985(2).

[10]单宝.北洋军阀政府的公债[J].史学月刊,1987(1).

[11]王素琴.中国国内公债小史[J].历史教学,1987(6).

[12]王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债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4).

[13]金普森,王国华.南京国民政府1933—1937年之内债[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2).

[14]王同起.评1927—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内债政策[J].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3).

[15]马陵合.晚清外债史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6]马金华.外债与晚清政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7]马长伟.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发行研究(1959—1962)——以安徽省为例[J].中共党史研究,2017(09).

[18]孙建国.论近代债信缺失与民国政府债信维护[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03).

[19]肖灼基.四大家族的公债投机活动[N].光明日报,1965-09-13.

[20]千家驹.关于四大家族国家垄断资本的一个研究——四大家族国家垄断资本与公债发行[J].经济研究,1962(10).

[21]戴一峰.区域史研究的困惑:方法论与范畴论[J].天津社会科学,2010(1).

[22]左治生.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十一辑(北洋政府部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23]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24]潘国旗.近代中国地方公债研究——以江浙沪为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25]刘杰.安徽近代地方公债研究(1910—1941)[D].安徽大学,2012.

[26]赵天鹏.民国时期四川省公债研究(1920—1941)[D].杭州师范大学,2011.

[27]潘国旗.近代中国地方公债研究——以皖川闽粤为中心的考察[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28]马金华,符旺.近代浙江地方政府债务及启示[J].地方财政研究,2015(2).

[29]潘国旗.北洋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探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

[30]陈海懿.南京特别市特种建设公债发行始末[J].档案与建设,2015(5).

[31]罗宁.武汉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8.

[32]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M].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

[33]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中国公债史料[M].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34]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35]黑广菊,刘茜.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36]蒙秀芳,黑广菊.金城银行档案史料选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37]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8]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39]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外债档案史料[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40]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41]马长伟.民初内债的举借及其后果[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0(6).

[42]姜良芹.试析1927—1937年国民政府内债发行的社会经济效应[J].民国档案,2004(4).

- [43]潘国旗.国民政府1927-1949年的国内公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 [44]孙建华.抗战前十年公债结构的变迁、原因及影响[J].学理论,2009(20).
- [45]刘杰.民国时期政府内债管理制度的变迁(1914-1927年)[J].学习与实践,2017(6).
- [46]姜良芹.南京国民政府1932年内债整理案述论[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4).
- [47]姜良芹.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内债整理案述评[J].近代史研究,2004(1).
- [48]姜良芹.1927-1937年国民政府公债市场监管体制评析[J].江海学刊,2004(5).
- [49]刘晓泉.国民政府地方公债管理政策述评[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1).
- [50]王平子,马长伟.中国政府的债务违约研究(1912-1936年)[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1).
- [51]廖常勇.清后期国债的财政制度效应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7.
- [52]江晓成.清代的京债与地方吏治[J].清史研究,2017(1).
- [53]缪明杨.中国近现代政府举债的信用激励、约束机制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 [54]吴慧.明清(前期)财政结构性变化的计量分析[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3).
- [55]孙迪.民国时期经济建设公债研究(1927-193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 [56]姜良芹.南京国民政府内债问题研究(1927-1937)——以内债政策及运作绩效为中心[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57]刘杰.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华中师范大学,2015.
- [58]燕红忠.近代中国的政府债务与金融发展[J].财经研究,2015(9).
- [59]杜恂诚.近代中国的政府公债与金融市场[J].财经研究,2012(9).
- [60]胡善恒.公债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61]姜鲁鸣.从一份公债合同看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几个特点[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1).
- [62]金学文.旧中国金融业的公债买卖[J].上海金融,1992(5).
- [63]邓宜红.试析1935年以前中国银行对待政府内债态度之演变[J].民国档案,1993(1).
- [64]钟思远.1927-1937年的中国私营银行[J].经济学家,1994(3).
- [65]朱荫贵.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中国银行业[J].中国社会科学,2002(6).
- [66]薛念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研究1915-1937[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 [67]诸静.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1917-1937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 [68]蒋立场.市场与政治之间的艰难平衡:近代上海银行业投资政府内债研究(1928-1931)[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 [69]刘杰.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华中师范大学,2015.
- [70]吴景平.上海钱业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若干内债——对已刊未刊档案史料的比照阅读[J].近代史研究,2004(6).
- [71]郑成林,刘杰.上海银行公会与1920年代北京政府内债整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
- [72]刘杰.行业利益与债信秩序: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公债(1927-1937)[J].国际金融研究,2015(10).
- [73]刘杰.商人团体与政府债务:以1927-1937年公债为中心[J].江西社会科学,2016(10).
- [74]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Bonds History of New China

Bi Xuejin & Ma Jinhua

(College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